

Column

思想

经济快速增长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好事:随着财富之拼的不断加大和丰衣足食,人们的满意程度会随之提高,进而社会日趋安定。与之相关的看法是,贫困乃社会动荡或暴力频发的根源。然而事实却不完全支持这样的判断。工业革命以降,300年间,尽管人均收入整体水平一直在上升,但人类目睹了众多的改革、革命和战争。更有甚者,历史还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尤其从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迅速迈进时,社会动荡爆发的频率反而更高些。根据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描述,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普遍发生在那些经济发达的邦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恰是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不满情绪最高。

奥尔森1963年的那篇论文“作为不稳定力量之增长”对此有过探讨。奥氏论证逻辑十分简单:经济快速增长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也意味着不同产业和地理区位之重要性的此消彼涨,还意味着不同类型劳动力之稀缺性的重新洗牌;所有这些,又势必引起收入分配上的广泛而巨大的调整。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中,通常会现大批受益者和受损者。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境况要好于其出生和成长的家庭背景,另一部分人则相反。无论是受益者还是受损者,他们的阶级或“种姓”归属均开始松动和破裂。更有甚者,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会因收入和工作地点的变化而改观。结果,这两类人的精神被经济增长带来的变化所撕裂,从而成为两股不稳定的力量。

在同一篇论文中奥尔森还提出,经济快速增长通常会创造出两类群体,即所谓的“新富民”和“新贫民”。随着“新富民”人数的增加,他们自然而然地将会运用其手中的经济力量去改变社会和政治秩序,以便更好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奥尔森把这批人称之为“心怀不满的获益者”。而生存状况不进反退的“新贫民”,由于绝对和相对福利水平的下降,对其贫困的怨恨程度远远超出了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者对贫困的怨恨。鉴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三者之间高度地相互依赖,故经济权力的重新配置无疑要反映到社会尊重和政治权力的分配上来,使得通向新的社会和政治均衡的过程具有高度不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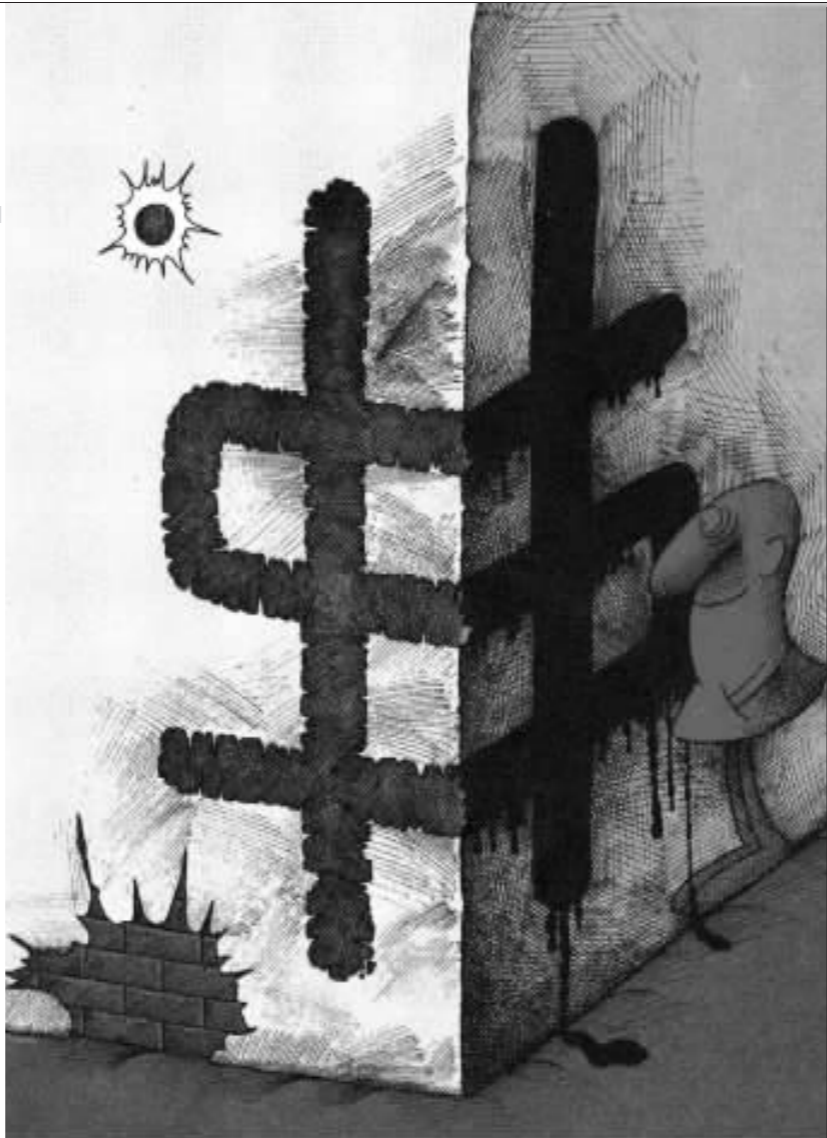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内部的各地区,经济增长快慢通常是非均衡分布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样构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原因。说到这里,我立刻想到西汉名臣贾谊的《陈政事疏》。刘汉所封诸王,大小各异,强弱不等。如果把各诸侯国的人口和物产视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则非均衡增长之后果便是诸侯

『托克维尔效应』
经济增长与社会动荡的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的造反。天下大乱,最苦的还是百姓。忧君忧国忧民的贾谊,为此提出了我称之为“贾谊定理”的“治安策”：“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由于社会地位恶化,受损者无疑会成为一支巨大的破坏稳定之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数量很少的受益者之所得总额非常巨大和集中时,社会的中位收入便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降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完全可能极大地增加受损者的数量。人均收入提高而受损者数量增多,这看上去和感觉相悖,但经济快速增长和日渐贫困人口数量递增两者并非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实际上同样也是存在的。在著名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论文(《美国经济评论》1965年3月号)中,库兹涅茨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命题。

经济增长必然会引引起收入增长,但收入的普遍增长、或成功地向绝大多数人分享增长好处是否有助于社会稳定,也一直是争论



这个转角几乎天天有事

不休的问题。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看来,并不在于人民的长期贫困,而在于他们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改善,在于法国大革命前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而稳定增长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这句话一听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却很可能“似非而是”的话,其要点在于人们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对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在他看来,当一个人同时被手铐和脚镣所束缚时,他对自由的憧憬微乎其微;然而一旦手铐被打碎,脚镣的存在就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托克维尔的见解如此具有“似非而是”性,我倒觉得不妨给它起个名字:“托克维尔效应”。

从既得利益的角度看,快速经济增长及其与之互为因果的制度变迁,往往也是构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4年前阿塞莫格鲁(D. Acemoglu)和罗宾逊(J. Robinson)在“以政治眼光看待经济落后”一文中论证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受到人们广泛欢迎的“增量改革或制度变迁”往往并不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因为在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或之后,并不存在可靠和充分的机制,以补偿失去权力的政治精英们。经济增长还使人们对实现更美好生活之可能性、对新意识形态以及对新政府体制的了解更加深化,从而激发起人们对“政府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预期。这样一来,既得利益精英阶层就会因为成为阻止变化的力量而与新利益集团发

生冲突,并由此爆发社会动荡。以上讨论的都是绝对收入的多寡。一旦进入相对收入领域,不稳定力量又多了一项重要的新来源:部分受益者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讲的理由在于,即使从绝对标准看经济增长使得受益者人数超过受损者人数,但某些或多数受益者却可能因为受益程度低于其他受益者而感到沮丧和不满。换言之,人们心中真正的追求是福利的相对水平提高而非绝对水平改进。这个结论很容易就让人想起孔子的那句名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经济增长结果的非中性,亦即经济增长对社会中不同的人或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指明的是人们往往更看重相对福利这一点极具普遍意义。

我写本文——其实主要是转述一些学人、智者的相关著述——的目的,是想阐明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引起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复杂。尽管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引起社会动荡的事例随处可见,但我们也可以找出许多主要导致于经济停滞或倒退的革命事例,比如中国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坦率说,大凡谈论这类问题者几乎都冒着掉入“归咎主义陷阱”的风险:人类历史经验如此丰富,以至于人们想证明什么就一定能够证明之。面对着相互矛盾的、彼此对立的史实事实,决定我们最终结论的关键,恐怕还是个人的修养、价值观和判断力。

大局

美元独霸油市的日头偏西了?



◎管清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所博士生

因为伊朗成立了以欧元为交易计价货币的石油交易所,国际石油的交易计价货币问题在近来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些权威机构和经济学家惊呼美元霸权时代就要终结。按照常理来说,在市场上买卖商品只是涉及到三个方面:买方、卖方和价格。国际市场应该也不例外。但为什么在涉及到用什么样的钱来买的时候会有这么严重的影响呢?或者应该这样问:国际石油交易为什么要用美元计价?这个问题还可以分拆成两个问题:为什么必须用美元计价?为什么是国际石油交易?

先来看看现实的情形是什么样。全球范围主要的石油现货市场有西北欧市场、地中海市场、加勒比海市场、新加坡市场、美国市场5个。石油期货市场有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以及最近两年兴起的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石油期货市场都是以美元作为计价、交易和结算货币单位的。欧佩克(OPEC)一篮子平均价所监督七种原油也是以美元作为交易计价货币的,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最重要的石油现货交易市场,即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混合油(Saharan Blend)、印尼的米纳斯油(Minas)、尼日利亚的博尼轻油(Bonny Light)、沙特的阿拉伯轻油(Saudi Arabian Light)、阿联酋的迪拜油(Dubai of the UAE)、委内瑞拉的蒂亚胡安油(Tia Juana)和墨西哥的伊斯姆斯原油(Isthmus)。

目前每年全球的石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即使不考虑其他贸易,光是控制全球贸易总额的10%的货币结算,美国的收益也是不可估量。

有人说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石油交易当然要用美元结算。这话只说对了一半。现在国际贸易的80%以上是以美元结算,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份额超过

60%,而在石油贸易中,美元是作为100%的结算货币(假定暂不考虑伊朗石油交易所的交易),据说这来自美国与沙特在1970年代达成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协议”,内容是沙特同意用美元为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这项协议具体出自哪里,笔者翻阅了很多文献也没有查到。由于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实际上,这等同于美元与石油挂钩。对美国来说,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重要的不是汇率的高低,而是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这就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概而言之,美国获得的好处大致有三:征收国际铸币税,影响和控制油价,让石油发挥黄金的作用。而最后这一点是笔者认为最关键的。

1978年的“牙买加协议”生效以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期。英国经济学家伯德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人为设计和经过专门的补充、修改组成的拼凑之作。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称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无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是相当松散的,其特点在于黄金的非货币化、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和汇率制度的多样化。

在牙买加体系下,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债务危机,上世纪90年代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区域性货币危机。负责维护国际货币秩序和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的IMF,并没有对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防范和援助起到应有的作用。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

国家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而美国在独享铸币税的同时,又不肯承担起维护和协调国际货币秩序的责任。国际货币领域内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分配、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大的事实都在催生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笔者猜想,虽然美国并没有宣布美元与石油的直接挂钩,也没有通过美元盯住石油价格的方式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但由于垄断了石油交易的媒介地位,美元即出现汇率波动也不至于发生崩溃的现象。通过垄断像石油这样的大宗商品的交易计价权,就保证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应该说,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行方式的变化。有人甚至称这种现象为“石油-美元”本位或者“半油本位”。不过,从长远来看,这样还是无法避免“黄金-美元”本位所面临的特里芬两难,只能延缓了这一过程。类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危机可能还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按照这种逻辑的推理,只要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放弃美元标准,就能推翻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放弃美元标准对其他国家的损失也很大,这涉及到结算货币转换的菜单成本,最致命的是各国外汇储备的大幅度缩水。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就像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所说的金融恐怖平衡。美元的霸权迫使人们不得不认同美元的标准货币地位。因为别人持有美元,所以我必须持有美元。因为我持有美元,所以别人必然会有美元。因而没有人敢轻易抛售美元。

不过,特里芬两难依然存在。特里芬两难所揭示的道理在于,一国货币是无法充当世界货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美国相当不情愿,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交易计价权会分散在几大货币身上,由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有没有可能赶上这一班车呢?

彼岸

请麻辣批评者当白宫发言人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
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放弃大笔收入,登上白宫的新闻发布台?

布什心理很清楚,在美国没有人(包括第一夫人劳拉在内)会与他有完全相同的看法,而不同的意见可以来自两个阵营,一是出于朋友的批评,二是来自政敌的攻击。托尼·斯诺是铁杆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曾经“服侍”过老布什,出任过老布什写作班子的主任,对布什的批评都在布什偏激保守派理念的方面,比如开支失控等。因此,布什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大度胸怀下向托尼·斯诺这个批评自己的朋友发出邀请。事实上,在宣布斯诺就任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提到斯诺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

布什也明白,托尼·斯诺曾经在白宫当过差的专业人士,懂得白宫发言人是不可像自己做新闻评论那样主观发言,而是需要传达和解释总统的政策和理念。如果托尼·斯诺愿意接任白宫发言人的职务,他会将自己的观点留给自己。布什看重托尼·斯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弥补即将卸任的考特·麦卡伦的一个最大弱点,即在美国新闻媒体围攻下的节节败退。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偏向自由派,尤其是与保守派的共和党政府为敌已经是非常公开的事情,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也并非完全怨斯科特·麦克莱伦的无力,在媒体的穷追猛打下,伊拉克战争、飓风灾难等难题也真是难为了原本就没有多少媒体经验而又书生气十足的斯科特·麦克莱伦。

看到每天主流新闻媒体对可怜的麦卡伦毫不留情的“修理”,许多保守派共和党人实在

是不忍心,单单出于保护麦卡伦的原因,就应该让他撤下白宫新闻发言台的“火线”了。相比之下,托尼·斯诺却是一个会令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和白宫记者头疼,也更值得尊重的对手。托尼·斯诺出道于新闻媒体,干过报纸的社论和评论主编,在福克斯有线新闻台做了近10年的收视率很高的新闻评论节目。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在遍布全美的福克斯新闻台主持每天3小时的政治脱口秀节目“托尼·斯诺秀”,雄辩滔滔的斯诺与许多对手对阵。令对手们折服的当然不是斯诺嗓门大,而是他在辩论中显露出来的冷静的思考、丰富的信息、文明的策略。毫无疑问,这些经验和素质正是白宫新闻发言“火线”所急需的。

斯诺放弃高收入的工作到政府任职无非是顺应了美国从政的一个规矩:要权力,就去联邦政府做官;要赚钱,就到商界任职。副总统切尼做CEO的时候年收入几百万美元,现在也说是大约20万美元的薪水。金钱是吸引人的,但却不是万能的。里根政府的发言人马林·费兹华特曾就白宫发言人的工作过这样的话:“你可能失去金钱、健康、家庭,但你仍然会认为那是最好的工作。”没错,斯诺将失去不少金钱,头发会更加花白,但他的家庭会与他同在,因为斯诺仍然是一个重家庭的人。斯诺对其他的听众讲过,如果他要去白宫,必须得到家人的同意,当然,斯诺也愿为自己的理念和国家的新闻发言台也的确是难以拒绝的媒体聚焦的位置。

乱弹

我的购汇申请书



◎周洛华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
上海大学金融学副教授

国人第一次有权去银行通过合法的途径兑换外汇了。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允许中国公民每年购买2万美元外汇。5月8日起,各地银行将向普通老百姓提供这项业务。

我觉得这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说明国家经济强大了,也说明政府更关心老百姓了。面对这样一场深刻的变革,我就像是第一次去坐火车的孩子一样兴奋地去去了银行,希望能够行使一下自己刚刚获得的购买外汇的权利。

银行员工告诉我,国家外汇储备太多,增长太快,因此希望老百姓多购买一些外汇。但是,购汇人必须首先递交一份署名的“购汇目的说明书”。这也难不倒我,我很快写了一份书面说明:我想

为政府分担过快增长的外汇储备压力,故而申请购买100美元。对我来说,其实明知购买的美元很快还会贬值,纯粹是为了过一把“第一次合法购汇”的瘾,这就类似于递交了一份无偿献血的志愿书。可遗憾的是,银行拒绝了我的购汇申请,他们认为我未能如实地申报购买外汇的真实目的。

我并不打算指责银行,尽管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有违宪之嫌。宪法明确指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财产的支配权当然也受保护,作为支配权的一部分,公民应该有权不公开披露自己打算如何支配财产。

对此,银行员工显得很无奈。他们也是在执行央行的规定。我尊重他们坚持原则的工作做法,不过我认为这种做法本身不值得提倡。若照此发展下去,可以想象将来我们生活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场景:你去商店购买一张大床,营业员要求你必须首先填写一份署名的床买申请书,明确地向政府坦白你打算和谁上床。而商店有权审核你申报的睡觉名单是否真实。

央行还应该进一步授权商业银行审核公民购买外汇的目的是否真实。然后,全国人大应该对公民的财产权作出进一步的司法解释:“第一次合法购汇”的瘾,资金用途是否真实,应该受商业银行的审核。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从银行出来,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一个相关故事。“施政以养民为先”,魏文侯这样的封建君主尚且明白这个道理。为此,他颁布诏书允许那些民间铸造的“私钱”兑换成官府铸造的合法铜钱,并且对过去铸造私钱的人采取了既往不咎的宽容态度。他希望通过藏富于民的治国方针达到增加国力的目的。

央行希望通过允许公民购汇这样的方法来缓解巨大的外汇储备压力,这种愿望和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估计这也是经济学家们给央行出的主意,他们认为允许居民购买外汇就能够增加外汇的需求,从而化解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压力。在我看来,允许居民购买外汇不仅无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反而还会刺激更多的外汇流入中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不允许离婚,那么这个国家的结婚率一定很低。

而如果一个国家允许离婚,人们反而更敢于登记结婚了。原先人民币很难通过合法途径兑换成美元,那些把投机人民币升值的人还需要承担万一美元升值人民币贬值时,无法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的风险。现在这种风险消除了,反而会促使投机客更加放心地把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了。

央行在美元强势的年代里实行“自动结汇”制度,使逐步升值的外汇自动成为国家的储备;在美元弱势的年代里,央行又开始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措施。在整个10年的时间里,美元从上涨到下跌,我们居然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现在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导致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量过大,由此引发国内房价上涨、经济过热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恐怕仍然在于央行未能及时调整外汇政策。

在任何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出现滞后乃至失误的情况都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应该追究任何人或者任何机构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很清楚:任何政策失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指出的是:最终承担这些代价的并不是中国人民银行,也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国人民。